

中国近代 教育哲学研究

魏义霞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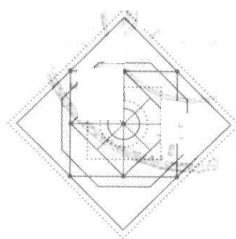


Zhongguo Jindai Jiaoyu Zhexue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 教育哲学研究

魏义霞 著



Zhongguo Jindai Jiaoyu Zhexue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教育哲学研究/魏义霞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12

ISBN 978 - 7 - 5203 - 1924 - 9

I. ①中… II. ①魏… III. ①教育哲学—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G40 - 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036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卢小生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 5
插 页	2
字 数	286 千字
定 价	80.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一节 救亡纲领与启蒙方案	1
第二节 不同路径与共同目标	6
第三节 教育救国与教育哲学	9
第二章 康有为的教育思想	13
第一节 教之释义	15
第二节 孔子的教育思想	24
第三节 变法维新与教育改良	37
第四节 理想的教育与教育的理想	47
第三章 严复的教育思想	58
第一节 “教育改良”	60
第二节 尊孔读经	65
第三节 导扬立国精神	74
第四节 严复教育思想的价值与误区	78
第四章 谭嗣同的教育思想	81
第一节 变法维新与“变通科举”	85
第二节 实学情结与专业教育	92
第三节 教育的普及与途径	103
第四节 谭嗣同教育思想的特色与误区	112

第五章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120
第一节 变法维新与教育改革	123
第二节 教育的宗旨	127
第三节 教育宗旨的改变	133
第四节 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145
第六章 孙中山的教育思想	152
第一节 对教育寄予厚望	155
第二节 政治教育	168
第三节 三民主义教育	176
第四节 教育、政治、革命的三位一体	185
第七章 章炳麟的教育思想	188
第一节 万众瞩目的教育家	190
第二节 爱国教育	194
第三节 国学教育	199
第四节 语言文字教育	217
第八章 结语	224
第一节 近代教育的转型	224
第二节 近代教育的普及	230
第三节 近代教育的成就	246
第四节 近代教育的误区	259
参考文献	272
后 记	275

第一章 导言

中国近代是备受西方列强蹂躏、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奋起抵御外侮、同仇敌忾的时代。如果说 1840 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使中国从一个领土完整的独立国家变成了半殖民地的话，那么，1894 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尤其是 1895 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则使中国人真切感受到了亡国灭种的逼近。中国在甲午海战中的惨败极大地刺激了近代哲学家，促使他们纷纷走向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的前台，严复更是最早喊出了救亡的口号。至此，救亡成为中国近代的最强音，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成为中国近代的历史使命和哲学主题。近代哲学家与所有先进的中国人一样，一面深入挖掘中国落后、贫困、衰微的根源，一面思考愈愚、疗贫、起弱的方案。他们提出的救亡纲领和启蒙方案既是拯救中国的纲领，又是启蒙思想、政治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近代哲学家秉持教育救国的理念，教育对于他们来说无论在救亡图存还是思想启蒙中都占据重要一席。与此同时，近代哲学家的教育理念和主张奠基在哲学理念之上，有些甚至直接与本体哲学、认识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或启蒙哲学一脉相承。这不仅使近代哲学家成为教育家，而且使他们的教育思想极富哲学意蕴和神韵，可以称为教育哲学。

第一节 救亡纲领与启蒙方案

对于近代的中国社会来说，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既是历史使命，又是时代课题。这使近代哲学家的教育哲学不仅拥有救亡图存、思想启蒙的双重维度，而且成为政治主张和启蒙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要深刻地把握中国近代的教育哲学，必须先了解近代哲

学家的救亡纲领和启蒙方案。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的十多年间把主要精力投向考辨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通过辨梳诸子百家的关系和中西文化比较，得出了中国的衰微在于孔子的微言大义闾而不发的结论。针对这种状况，他指出，只有发明、弘扬孔教之真教旨，才能保国保种，由此提出了立孔教为国教的救亡纲领和启蒙方案。于是，康有为将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凭借保教来保国保种，他的具体论证从三个不同角度展开：

第一，康有为断言：“‘六经’皆孔子作，百家皆孔子之学。”^①在宣称孔教囊括百家之学的前提下，他以孔教凝聚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寻找统一的精神家园和心灵皈依。

第二，在康有为那里，孔子之学简称孔学，与孔子之教、孔教异名而同实。“百家皆孔子之学”证明，中国是教化之邦，具有自己的宗教，那就是孔教。更为重要的是，孔教不但不比西方的耶教（基督教）逊色，反而早于且高于耶教：一方面，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进化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学科都是孔教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出孔学范围。另一方面，耶教是作为孔教之一的墨教西传的结果，而墨教则既出于孔教，又由于墨子“只偷得半部《春秋》”而只得孔教之“一端”“一体”。

第三，康有为指出，孔子的教义尽管远近大小精粗无所不包，却可以归结为一个字，那就是：仁。仁的基本内涵是博爱、自主和平等。沐浴孔教的恩泽，中国早在二千年前就已经废封建，立郡县，故而贵族横扫，早于西方实现自由、平等了。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到如此境地，是由于在外部老子、墨子和孔子争教与内部荀子等人的破坏下，孔教大义暗而不明。分析至此，康有为力图让人相信，发明孔教的微言大义，立孔教为国教是拯救中国的不二法门。做到这一切的前提则是借助宗教的力量，提升人们对作为中国本土文化象征的孔教的敬仰之情，以此激发中国人奋起抵御外侮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严复对于达尔文进化论系统输入中国功不可没，进化论也给他本人的思想以巨大影响。正是惊心动魄于生物进化的竞争法则，严复确立了

^① 《万木草堂口说·学术源流》，《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页。

“自强保种”的救亡纲领和启蒙方案，并且极力驳斥康有为等人提出的通过保教（孔教）来保国保种的主张。对于这个问题，严复的论证从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政教相混是中国致弱的根源，西方国家历来都教学殊途，故而科学昌盛，文明日进。这足以证明通过保教来保国保种的方案行不通，康有为犯了方向上的错误。

第二，中国流行的宗教非佛教即土教，总之，并非像康有为所说的那样是孔教。既然孔教并非中国的国教，结论便不言而喻——即使保教，也轮不到孔教。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自达尔文出，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盖自有哥白尼而后天学明，亦自有达尔文而后生理确也。”^①严复借此发挥说，既然人是生物进化的一个阶段，那么，人便与生物一样遵循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这意味着人只有自强，以自己的才力心思与妨生者为斗，才能有生存的希望，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基于上述分析，严复独辟蹊径，最终确立了“自强保种”的救亡和启蒙路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造中国的基本纲领。具体地说，他利用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指出，国家、群体犹如生物有机体，国民则是构成国家这一有机体的细胞；正如生物有机体的优劣是由细胞决定的一样，国家的强弱兴衰取决于国民素质的高低优劣。沿着这一思路，严复将“自强保种”具体化为提高中国人的国民素质，一面指出国民素质由“血气体力”“聪明智虑”和“德行仁义”三部分构成，一面大声疾呼提高中国人德智体三方面的素质。由此，“鼓民力”“开民智”和“新民德”成为严复进行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的基本途径，也成为他改造中国的三大纲领。

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给谭嗣同以强烈刺激，也使他深刻反省从前的哲学理念，进而谋求新的救亡方案。在这种动机的驱使下，谭嗣同踏上了著名的“北游访学”之旅。通过遍访耶稣会士、佛界人士，他接触到各种新奇学说，哲学思想发生巨变，在由气学转向心学的同时，确立了“以心挽劫”的救亡纲领和启蒙方案。这一转变的过程被

^① 《天演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谭嗣同记录在写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仁学》便是为“以心挽劫”而作。谭嗣同提出“以心挽劫”,试图凭借心之力量来救亡图存。他断言:“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①如此说来,只要中国人之心力骤增万万倍,中国的劫运自然可挽。“以心挽劫”的具体方法有二:一是唤起、增强人的慈悲之心,以慈悲之心相互感化,化解机心;二是“改变脑气(即神经——引者注)之动法”,以此泯灭机心,断灭意识,臻于“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②的境界。谭嗣同相信,凭借这套方法“以心挽劫”,不唯可以拯救中国,甚至可以连同“极强盛之西国与夫含生之类,一切皆度之”。^③

梁启超将中国人的真正觉醒说成是甲午海战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对中国致弱根源的探究和救亡纲领、启蒙方案的建构亦缘于此。在对甲午战争的分析中,梁启超将中国人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缺乏爱国心说成是中国战败的原因,并且循着社会有机体论的思路,声称“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④由此,新民成为拯救中国的不二法门。有别于严复德智体三育并重的“鼓民力”“开民智”和“新民德”,梁启超的新民说表现在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上则是侧重道德上的新民,旨在激发、培养中国人的公德意识、群体观念、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此,梁启超一面批判以独善其身、束身寡过、洁身自好等私德为核心的旧道德,一面提倡以权利意识、国家思想和公德观念为核心的新道德。他坚信,中国的振兴之路必须从新民做起,新民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宣称:“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⑤

作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终生都在为中国的独立富强殚精竭虑。他将中国的希望寄托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① 《上欧阳中鹄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60页。

②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95页。

③ 《上欧阳中鹄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61页。

④ 《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55页。

⑤ 同上。

试图以三民主义救中国。依据他本人的解释，三民主义在本质上与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别无二致，其中，民族主义对应的是平等，具体指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平等；民权主义对应的是自由，旨在打破政治上的不平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民生主义对应的是博爱，核心是平均地权，旨在让百姓都有饭吃、有衣穿。在这个前提下，孙中山强调，之所以将自由、平等、博爱称为三民主义，是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而来的——三民主义不仅可以毕经济、政治革命之功于一役，而且可以避免西方国家由政治革命带来的诸多弊端——如贫富差距等。

章炳麟坚决反对严复、梁启超等人基于社会有机体论的逻辑解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并基于这一逻辑建构救亡、启蒙之路的做法。严复、梁启超认为，生物是以种群为单位进化的，人的生存竞争说到底还是种与种、群与群之间的竞争。因此，作为国群的细胞，个人不能离群索居，而必须组成国家和群体，个人的生存必须仰仗群体的庇护。这表明，为了自身的生存，个人必须固其群、善其群和利其群。章炳麟针对严复、梁启超的观点指出，个人与国家、群体的关系不可比作细胞与有机体的关系，因为个人与细胞之间没有可比性：细胞不是独立的实体，离开生物有机体便无法存活；个人是独立的实体，可以自由选择国家而存在。基于这一认识，为了反对严复、梁启超“被动”爱国的做法，章炳麟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以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情”^①的救亡纲领和启蒙方案。

上述内容显示，与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时代要求和现实观照相呼应，近代哲学家既凸显教育的重要性，又赋予教育思想有别于其他时期的鲜明特征。归纳起来，近代教育的最大特征有二：第一，从受教育的对象来说，是全体国民而非少数精英。第二，从教育方式来说，是“开门”教学而非“关门”教学。这两点秉持一个共同的目标，一言以蔽之，即提高中国人的素质。这与中国近代救亡与启蒙的时代主题相呼应，也使近代哲学家将教育提到了关系国家存亡的高度。有鉴于此，教育的地位在中国近代急骤提升，同时具有了向全体国民灌输爱国主义、普及科学知识的重任。

^①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2页。

第二节 不同路径与共同目标

近代哲学家的救亡纲领和启蒙方案彼此之间迥然相异，各有侧重，却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让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成为独立富强的国家。这是近代哲学家共同的“中国梦”，在维新派与革命派那里的具体表现和现实形态却差若云泥，具体操作和政治理想更是集林集枯：一个是建立君主立宪的国家，一个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前者以康有为、严复、谭嗣同和梁启超为代表，后者以孙中山、章炳麟为代表。

就康有为、严复、谭嗣同和梁启超组成的戊戌启蒙四大家来说，尽管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梦想和奋斗目标是相同的，具体规划和步骤措施却相去甚远。一言以蔽之，康有为信凭宗教信仰的力量，严复偏袒科学力量，谭嗣同鼓动心之力量，梁启超则倚重道德力量。这使四人的救亡、启蒙路径沿着不同的致思方向和具体操作展开，也预示了四人教育理念的差异。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例，一方面，两人的思想最为接近，在许多问题上观点相同，如将诸子百家归结为孔学一家，以孔教对抗耶教，声称仁是孔教、佛教和耶教的共同宗旨，断言仁的基本内涵是平等，把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平等，在人与人、种与种、国与国的平等中臻于世界大同，等等。另一方面，康有为、谭嗣同的救亡纲领和启蒙方案呈现出不容忽视的差异：康有为大声疾呼保教，谭嗣同却认为教无可保。这一分歧导致两人的救亡纲领和启蒙方案渐行渐远：康有为将中国的命运与孔教捆绑在一起，对孔子、孟子和董仲舒代表的儒家思想顶礼膜拜；并在这个前提下，借助保教与保国、保种的三位一体为立孔教为国教张目。谭嗣同尽管像康有为一样抨击以荀子等人为首的儒家人物败坏了孔教，却没有像康有为那样将中国的希望寄托于恢复孔教之真教旨上；而是一面谴责儒家败坏了孔教，一面将儒学与孔教分别对待，并沿着这一思路在儒学之外依凭佛教拯救中国乃至全世界。这些区别不仅注定了康有为、谭嗣同教育思想的不同来源和内容侧重，而且使两人教育哲学的理论视野和培养目标渐行渐远。

再以康有为、严复、谭嗣同和梁启超四人的启蒙方案为例，可以分

成平等与自由两个不同阵营：康有为、谭嗣同的救亡纲领和启蒙方案可以归结为平等，严复、梁启超则与康有为、谭嗣同的平等路径迥异其趣——不仅循着社会有机体论的致思方向和价值旨趣将社会、国家等群体视为有机体，同时将国民视为构成社会、国家的细胞；而且将中国的出路寄托于自由，推出了依靠自由、提高国民素质，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的“中国梦”。与此相对应，自由教育在严复、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中占据核心位置，无论是两人旨在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理念还是对自由的宣传均与康有为、谭嗣同具有明显区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严复、梁启超的思想在康有为、谭嗣同的映衬下呈现出诸多相同性，然而，两人“中国梦”的实施方案却大相径庭，呈现出一外一内、一法制一道德的明显区别。具体地说，严复从个人与政府的关系入手界定自由，将自由理解为行动自由、有权做事——为了突出这一点，他特意将自由写作“自繇”，以示自由并非限于言论，而是拥有实实在在的权利。基于这一思考，严复呼吁开设议院，在宪法上规定国民与政府的权限。梁启超不是像严复那样从外部——行动自由或者个人与政府的关系入手界定自由，而是热衷于在精神的维度上诠释自由，将自由界定为自由之德。因此，正如新民寄希望于国民“自新”和“道德革命”一样，他所开辟的自由路径凸显精神力量。在这个前提下应该看到，对自由的不同理解使严复、梁启超的教育模式和重点泾渭分明：严复侧重从立宪、权利的角度宣讲自由，《自由讲义》等是其典型代表；梁启超侧重提高民德，《新民说》《德育鉴》等是其代表作。

就章炳麟和孙中山来说，共和梦是相同的，具体路径却不尽相同：章炳麟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以国粹救国使他致力于国粹之宣传和国学之研究，辨梳百家、抵制康有为所讲的孔教成为他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的重点，以语言文字为首的国学教育成为章炳麟教育思想的特色招牌和亮丽风景。孙中山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国父”身份使他的教育面向全民，最主要的则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和军人。于是，面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三民主义教育必不可少，三民主义教育和军人精神教育也由此成为他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的重镇所在。由于相信心是“万事之本源”，孙中山将教育的重点锁定在精神教育上。对于这一点，无论是“心理建设”还是《军人精神教育》都是明证。

近代哲学家的教育理念和主张承载了他们的富国梦、强国梦。特殊

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处境使中国近代的富强与摆脱西方列强的奴役互为表里，也注定了他们对“中国梦”的构想在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维度上展开。由此，引发了近代“中国梦”两个与生俱来并且引人注目的特征：第一，关注大同。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的闭关锁国，中国被突如其来地卷入“世界历史”之中。这使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成为现实的社会课题，近代哲学家也不得不将这一课题纳入视野。对于这一不容回避且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均诉诸大同，用大同社会构筑未来世界的理想蓝图。由此，大同成为近代哲学的核心话题，对大同社会津津乐道成为近现代哲学的独特风景。第二，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中国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而将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或国家视为“夷狄”，即便是在舟车大开之后，对西方国家亦作如是观。在这方面，乾隆皇帝对英国使节——马嘎尔尼的做法将“天朝大国”面对“夷狄”的心态表露得淋漓尽致。

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使中国人见识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由此认识到中国的衰微贫困，并且领悟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只有奋发图强，中国才能扭转落后挨打的命运是近代哲学家的共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究竟如何才能奋发图强？是对西方列强亦步亦趋地唯西学之马首是瞻？还是挺立民族精神，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振兴、富强之路？无论是近代哲学家对大同的态度还是对大同社会的构想都蕴含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而他们的回答又直接牵涉出如下问题：中国在未来的世界中是以民族国家的姿态而个性尽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是消除国家、种族之别而混同于世界之中？对于这个问题，康有为、谭嗣同主张取消国家，同化人种。这意味着“中国”在大同社会中已经由于取消国界而荡然无存，作为中华民族的黄色人种也将不复存在。更有甚者，两人认为，大同社会应该有同一文化、同一语言文字。届时，中国的文化将被西方文化取代，西方的字母文字则代替中国的象形文字。至此，康有为、谭嗣同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背离了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初衷，最终迷失在大同之中而遗忘了来时的路。严复、梁启超和孙中山则坚持民族主义立场，严复甚至绝口不谈博爱和大同社会。梁启超从早年听闻康有为讲大同而“盛言大同”到后来一针见血地指责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是世界主义、大同主义，对于近代的中国来说无异于宗教家的梦呓，缘于对民族主义的坚守。尽管孙中山对大同社会魂牵梦萦，然而，

他的大同愿景却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设想不可同日而语。在孙中山构筑的大同社会中，中华民族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中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第三节 教育救国与教育哲学

近代哲学家的救亡纲领和启蒙方案呈现出巨大差异，却都离不开教育。这使教育救国成为他们的共识，也使教育在中国近代直接与中国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近代身处几千年未有之变局，无论是中国的命运还是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急剧变化：一方面，西方列强发动的以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为代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使中国丧失了主权，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另一方面，在亡国灭种的刺激下，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觉醒。近代哲学家在对封建专制的批判与甲午战败原因的探源中，既认识到了中国的愚昧、落后，又切身感受到了个人与国家命运的唇亡齿寒、休戚相关。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在将中国逼到亡国灭种边缘的同时，也激发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爱国热情。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的崛起，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从古代的封建帝国到近代的民族国家的转型。事实上，从西方列强踏上中国领土的那一刻起，中国人就在奋起抵抗中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救亡运动，并由此拉开了百折不挠、热火朝天的思想启蒙。尽管每一位近代哲学家对中国落后挨打的分析以及由此提出的救亡纲领和启蒙方案各不相同，然而，肯定古代教育的失败和寄希望于教育改良则是他们的共识。正因为如此，近代哲学家对教育寄予厚望，将教育的地位和功能也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个背景下，中国近代出现了教育救国的思潮。

1902年，蔡元培、章炳麟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并公布其宗旨是“编订教科书，改良教育，以恢复国权之基础”，并以中国教育会为阵地，结集爱国志士从事反满革命活动。在两人的多方呼吁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教育会于同年4月27日正式成立，推举蔡元培为会长。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教育会的出现显然受到了西方学会的影响，同时也表现出对教育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教育会的宗旨是“改良教育，以恢复国权之基础”。这一宗旨明确规定了近代教育有别

于古代，肩负思想启蒙的重任，故称教育改良；并且与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致使教育成为救亡图存的一部分。有了这些，便有了近代教育的宗旨、内容和方法，近代的教育哲学便是这一思潮的直接产物。

可以作为证据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1843年出版，之后20年（1843—1862年）间在中国一直无人问津。《海国图志》1851年传入日本，受到意想不到的欢迎，一时间洛阳纸贵，10年间发行了15版，书价涨了3倍。这就是说，《海国图志》可以作为了解西方的窗口，具有经世致用的现实价值。之所以在中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主要原因不在于书的内容本身，而在于中国人尚未真切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危险处境，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麻木不仁、视而不见。真正促使中国人普遍觉醒的则是中日甲午战争。诚如梁启超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①正是在以甲午海战为开始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刺激下，以维新派和革命派为主力的近代哲学家走到了历史前台，纷纷推出了救亡图存的纲领和思想启蒙的方案，而以教育改革为核心的教育哲学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哲学家的教育哲学围绕着救亡图存、思想启蒙的立言宗旨和最终目标展开，不同的救亡纲领和启蒙方案则使他们的教育理念、教育方针和教学内容呈现出巨大差异：康有为的救亡方案是立孔教为国教，这使他寄希望于孔教，倚重的是宗教信仰的力量。与此相一致，康有为教育理念的突出特点是教学相混，无论是戊戌变法前的收徒讲学还是戊戌变法时期提倡的国民教育，均以孔教为主要内容。有鉴于此，他在“百日维新”期间上书皇帝，一面建议废除八股、变革科举，一面奏请提升孔教地位。至于戊戌变法之后流亡国外的康有为，通过对世界各国的考察不但没有因为视野的开阔而放弃孔教，反而更加坚定了立孔教（儒教）为国教的决心。谭嗣同试图“以心挽劫”，既需要骤增中国人之心力，又需要改变科举考试的内容。而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实学”：第一，经历“北游访学”，他认识到“惟一心是实”，“以心挽劫”也就意味着以“实学”拯救中国。第二，谭嗣同提出的改变科举的具体办法不是抛弃“洋务”而另觅蹊径，而是借助科举推行“洋

^① 《戊戌政变记》，《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页。

务”，故而建议将各种“实学”作为考试科目。严复“自强保种”的救亡方案将教育的宗旨定位在中国的自强上，具体办法则是全面提高中国人身体、知识和道德三方面的素质，这使体育、智育和德育在国民教育中一个都不能少。由于秉持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理念，他在德智体三育中突出智育，无论是教育的内容还是方法均借鉴了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模式。梁启超坚信，中国的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舍弃新民之外，别无他途，而他所寄予厚望的新民则主要指道德上的新民。因此，正如在《新民说》中首倡“道德革命”一样，批判以洁身自好、束身寡过和独善其身为核心的旧道德，培养以权利、义务观念、国家思想、公德意识和进取冒险为核心的新道德成为梁启超的教育重点和目标。他编写的《德育鉴》《中国之武士道》等教科书以及《论教育当定宗旨》《余之生死观》等一系列论文都是进行国民教育的产物。章炳麟反对严复、梁启超基于社会有机体论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比作细胞与生物有机体而导致的被动爱国，并在此之外开辟了一条“以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情”的救亡路线。这使弘扬国粹，借助国粹激发爱国情感成为他进行国民教育的主要内容。于是，普及国学教育成为当务之急，开办国学讲习所宣讲国学成为章炳麟终身乐此不疲的国民教育事业。由于断言国学由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三个部分构成，将语言文字置于国学之首，他对国民的国学教育以语言文字为基础。与此相联系，章炳麟对汉字的普及投入极大热情和努力，并且针对取消汉字的呼声，一面研究、保护方言，一面简化汉字，为汉字注音，千方百计地传承中国的语言文字。孙中山坚信三民主义救中国，三民主义成为他对国民进行教育的必修课。鉴于对中国自由状况的考察和对国民的期望，孙中山在限制自由、平等的同时，奋力高呼博爱。为此，他号召革命党人和国民对自由予以保留，将自由用到国家上去，而万万不可用到个人上去。《三民主义》《心理建设》便是他宣传民权、讲解自由，对以革命党为首的国民进行国民教育和心理辅导的课本。

一方面，近代哲学家的救亡纲领、启蒙方案基于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现实思考和理论审视，故而拥有相同的立言宗旨和价值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教育哲学拥有相同的理论初衷和共同目标。另一方面，近代哲学家拥有各自不同的致思路径和哲学理念，这使他们的教育理念拥有不同的思想来源和主体内容。例如，就理论来源上对中西思想的侧

重而言，大致说来，康有为、谭嗣同和章炳麟以中学为主，严复、梁启超和孙中山则以西学为主。就作为教育哲学根基的哲学理念来说，康有为的哲学脱胎于公羊学，大体上以儒学为母版；谭嗣同的哲学杂糅了佛学、中学和西学——借用梁启超对《仁学》的评价即“欲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而更使适于人生之用，真可谓极大胆极辽远之一种计划”^①，以佛学为归宿；严复在哲学上崇尚理性，尽管早年推崇老庄、晚年提倡尊孔读经，并对佛教表现出难以按捺的好感，然而，从整体上看，则以英国的经验论、不可知论为蓝本；梁启超的哲学崇尚情感，以生命哲学为依托，在中西和合中侧重建构人生哲学；章炳麟公开宣布“独尊法相”，在以宗教发起信心、增进革命道德的期待中，阐发唯识妙谛；孙中山对进化论的推崇无以复加，这并不妨碍他在运用进化论解释世界万物的由来和勾勒历史进化轨迹的同时，夸大心之力量。由于坚信精神力量实居八九，物质力量仅居一二，孙中山最终走向“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的心学。

进而言之，对于近代哲学家来说，无论是救亡纲领、启蒙方案还是为之服务的教育思想皆基于不同的哲学理念。如果说哲学理念的迥然相异促使他们找到了不同的救亡之方和启蒙之路，并且在古今中外的思想库中选择不同的理论武器为之辩护的话，那么，这些又反过来进一步贯彻、彰显了近代哲学家各自不同的哲学理念，致使他们的教育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各自建构的哲学形态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近代哲学家的教育思想可以称为教育哲学。这不仅是因为近代哲学家的教育理念和主张植根于哲学理念之上，与他们的哲学理念息息相通；而且是因为近代哲学家侧重从整体上思考、规划教育，在对中西教育的审视、比较中探究教育的基本问题。与此相一致，他们热衷于从宏观上为中国的教育提供解决方案，而不是侧重对某一教育环节、教育内容的专门问题进行解答。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以近代哲学家为个案，专职教育家的教育实践或教育思想并不在本书的视域之内。

①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2页。